

明清文學中的

西南敘事

The Southwest
in
Ming-Qing Literary Imagi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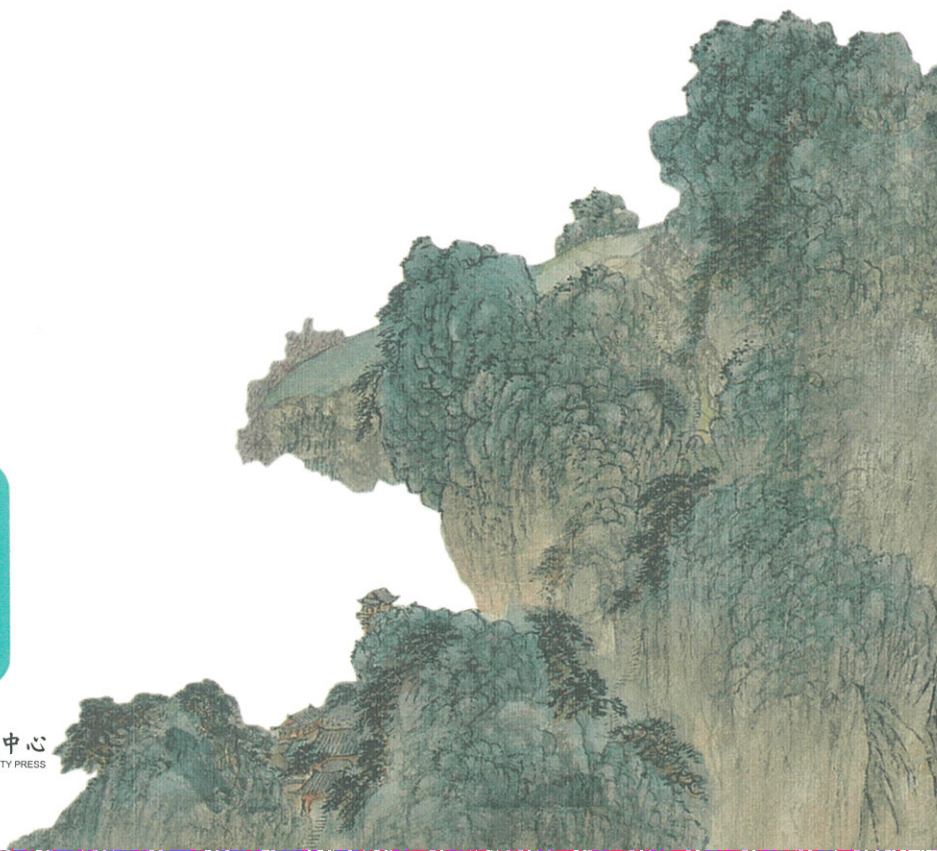
胡曉真

著

科技部
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

補助出版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目次

序文 寫在華夏邊緣／王德威	xvii
自序	xxiii
導論	001
第一編 情感與世界——西南敘事的內向與外向詮釋	035
第一章 從峒中跳月到天下輿圖	037
第二章 旅行、獵奇與禮學考古	085
第二編 戰爭與統治——官員視野的政治暴力與個人美感	133
第三章 炎徼與我鄉	135
第四章 治理之書與審美經驗	177
第三編 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明清與當代的交錯視域	217
第五章 前有奢香後良玉	219
第六章 華夏忠臣遭遇邊域保蟲	251
第七章 代結論：征、流、寓	293
徵引書目	333
索引	361



導論

「中國西南」是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經典題目，卻是文學研究的新課題。若以較廣闊的視野來看，自《史記》有〈西南夷列傳〉以來，中國王朝便不斷留下與西南地方接觸的文字紀錄，降至明清，特別是清代康雍乾嘉時期，帝國對多民族的西南地方的研究空前發展，不少官方與私人的文字記載都可視為古典的民族志。到了十九世紀，更有一批學者對邊疆進行專門的研究，被當代學者稱為「中國近現代史中第一次邊疆研究高潮」。¹晚清時期開始，從西方人士的考察，²到日本學者的研究，³以至民國時期本土學者的探勘，⁴都為後來的人類學者開啟研究的視野與道路。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學界重視西南自不待言，以為「統一多民

¹ 馬大正、劉遜，《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58-59。

² 晚清時期，西方的官員、商人、傳教士都曾因不同目的考察西南地區，留下資料或著作。參見楊梅撰，賀聖達審定，〈晚清至民國西方人在中國西南邊疆調研資料的編譯與研究〉，《清史譯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0輯，頁291-334。可說西南研究作為一種現代的知識生產，正是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西方殖民擴張階段成立的，在人種、體質、語言、宗教等方面的考察尤其突出。參見沈海梅，《中間地帶——西南中國的社會性別、族性與認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8。

³ 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在二十世紀初進行田野調查，並於1907年出版《苗族調查報告》，對其後數十年的苗族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⁴ 凌純聲、芮逸夫在30年代進行苗族調查，後出版《湘西苗族調查報告》；1932年，楊成志出版《西南民族研究》；石啟貴在40年代進行調查，後出版《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都與當時中國的民族立場密切相關。王明珂對此有精確的描述與分析，他指出在近代國族建構的過程中，中國西南與南方邊疆的非漢民族是最模糊的「邊緣」，因此早期的民族研究的田野工作都集中於此。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14-215。



族國家」服務為最高指導原則的「邊疆研究」也包括對西南地區的討論。而在臺灣人類學界，中國西南民族也仍然是重要的論題，不斷出現學術論著，發展新的問題，乃至提出全新的詮釋角度。⁵至於美國人類學界，西南研究自八〇年代以後亦儼然學術熱點。⁶另一方面，「西南」也受到歷史學者的注目，因為「西南夷」作為帝國的邊區，自古便是矛盾衝突與戰略資源會聚之地。以元明清時期來說，雲南之納入版圖，貴州之開通驛道，川滇黔桂此伏彼起的民族衝突，改土歸流的政治改革與邊疆治理，物產礦冶的開發利用等等，在在都是歷史研究的本務。然而本書既非人類學的研究，也不是歷史學的析論，而立意於文學的探討。相對於人類學與歷史學在中國西南問題上長期的工作，除了所謂「少數民族文學」這一領域（例如「彝族文學史」），或者以地域為範圍（例如「貴州文學史」、「雲南文學史」這類以漢文文本為材料的研究）的探討以外，文學研究並未以西南作為一個思考的中心或範圍。其實，以明清時期而論，西南地方的歷史、地理、文化在文學中絕不缺席，作者的體驗與想像、思想與社會的發展、政治與

⁵ 王明珂在 90 年代末期曾爬梳臺灣的西南民族研究流變與特色，指出當代臺灣的西南研究脫離傳統「民族史」，朝向結合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研究旨趣，以及歷史學、人類學的融合。參見王明珂，〈臺灣地區近五十年來的中國西南民族史研究〉，收入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 年），頁 281-317。另外，中研院史語所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資料庫」便彙集有關西南的研究資料，包括文物、文書、照片。參見：http://ndweb.iis.sinica.edu.tw/race_public/index.htm。另有由王明珂帶領一群從事西南民族的學者所建立的「村寨網：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網站，除展示史語所收藏之西南文物外，也整理相關研究論著與學位論文，更直接面對西南研究與中國近代國族主義的關係。參見：<http://ethno.ihp.sinica.edu.tw/index.htm>。而出入於史學與人類學之間的王明珂提出的「華夏邊緣」觀念，更重塑了對包括西南在內的「邊緣」地區民族的認識。

⁶ 例如，八〇年代末以來美國人類學界熱衷西南研究，聚焦國家與地方、中心與邊緣的關係，探討中國內部文化的多元與異質性。參見彭文斌、湯芸、張原，〈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美國人類學界的中國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 年第 11 期（2007 年 11 月），頁 9-16。



個人的糾纏等等，無一不在文學中有所表現。這裡所謂文學，取義較廣。由於西南是一極為駁雜的領域，因此既以此為題，除詩文、小說、戲曲、筆記是文學研究應有之義，史傳、志書、奏議等，也不只提供歷史背景的參照，而應回到傳統「文學」的定義，視其為文學文本，與現代意義的文學文類並觀。以是，為了突出討論材料的多元，我以「西南敘事」一詞，概括指稱涉及中國西南地方各種議題的不同文類的作品。我之所以使用「敘事」而非相對自明的「書寫」，意在突顯不同類型的文本在表現西南時蘊涵的高度敘事性，亦即觀點、記憶以及構造。一旦我們以這個視角重新覽讀明清文學，便會發現「西南」不曾成為文學研究的題目，並不是因為文本匱乏或議題貧弱，而恰恰說明我們的文學視野受限於習而未察的「中心」觀點，未能觀照由邊緣反指中心的動能。反過來看，明清文人西南敘事之駁雜多元的特色，亦說明我們必須把這些文本放在時代、地理、政策、民族、性別等種種脈絡化的思考中討論，才能剝顯、煥發其掩藏於獵奇外衣下的豐富面貌。

地理上的現代中國「西南」地區，大致包括雲貴高原與四川盆地，⁷而歷史文獻上提到的中國「西南」，往往隨著時代（也就是帝國「中心」的位置）有所變遷，但大概總不出雲、貴以及川南、桂西、湘西、鄂西、西藏一帶，⁸而這些地方經常被視為邊徼地區。無疑地，這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漢族文化的觀點。由此觀點出發，歷代文獻提到地理上的「西南」便常常與文化上的「蠻夷」劃上等號。《史記》的〈西南夷列傳〉首次將西南作為一個整體

⁷ 例如，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分全國為七大政區，其中西南地區在行政上指重慶市、四川、雲南、貴州、西康等區域。參見史為樂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區沿革（1949-197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近期就經濟發展之考慮，則普遍有所謂「西南六省（區、市）」之說，包括重慶市、四川、貴州、雲南、西藏、廣西壯族自治區。

⁸ 西南研究書系編委會，〈總序〉，見徐新建，《西南研究論》（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9。



來描述，⁹解釋漢帝國如何接觸位於「巴蜀西南外」的滇國與夜郎國，以及邛、徙、笮、冉駹、白馬等等部落，最後透過武力的征伐與鎮壓，將整個西南分設七郡。¹⁰太史公以極為精煉的敘事藝術，表述漢帝國如何分殊、理解滇黔地區的民族與文化，以及這一區域對帝國來說具有什麼經濟與戰略的意義。他的眼光影響深遠，不但《漢書》及《後漢書》的〈西南夷傳〉延續其精神，¹¹後來的歷史、方志書寫也離不開他的基本觀點。

那麼，何以明清文人的西南敘事值得專題探討呢？簡單地說，「西南」是明清文學中一個特別且重要的主題，是文化、政治、戰爭、美學、地理、民族、性別等諸多問題的輻輳交點。明清文人與西南地區的接觸遠較前代為多，相關敘寫亦更為豐沛；我們若留心巡覽明清文人的集子，便會發現許多重要文人學者都有西南經歷，並留下受西南歷史、風物啟發的作品，例如王陽明、楊慎、王士性、徐霞客、吳嵩梁、趙翼、洪亮吉、舒位、查慎行等等，而西南本地也不乏知名文士，如周漁璜、莫友芝等，乃至於沐氏、木氏等地方政權內的文化活動。文人面對西南地方的態度之所以有所改變，又可以分兩個層面來理解。其一，明清兩代的政策發展。對西南「邊徼」，中央政府不再滿足於鬆散的羈縻關係與土官制度，而更為積極地處理，逐步朝向直接統治發展。因此，有更多派任的官員、幕僚與西南地方長期接觸。其二，明代文人的探索精神與旅行風氣互為表裡，對自然風物與人文社會

⁹ 徐新建，《西南研究論》，頁 57。

¹⁰ 司馬遷，〈西南夷列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116，頁 2991。

¹¹ 班固，〈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95，頁 3837-3846；范曄，〈南蠻西南夷列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卷 86，頁 2829-2850。



的觀察理解成為學問，也成為遊記表達的重點。¹² 在此風氣下，景物殊異的西南便吸引了文人的腳步與想像。這種以追求新的知識視野為本的「好奇領異」的心態，至清初猶然不衰，事實上亦關乎近代中國的地理學熱度與思想的發展。綜合以上兩個因素來看，明清時期，西南地區早在帝國版圖之內，但對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員而言，這是游移反覆的邊緣地帶，而對多數中國文人來說，其自然與人文景觀所帶來的陌生感，更何異於異域外國？當代學者王明珂提出「內部他者」¹³之說，確實在明清時期即是如此，於是文人的作品深切結合文化的衝擊與交流，表現出複雜的美學、情感與思想特色，明清文人的西南敘事之所以值得重新探討，原因即在於此。

無論就歷史上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而言，或就山川、地理、物產的特色來看，又或人文、風俗的發展，都使得由外地前來西南地區的文人產生陌生、恐懼、好奇、歡喜等等不同層次的心理反應，也一一在他們的書寫中呈現出來，又或者壓抑下來。外來文人的身分也深深影響他們的書寫類型與內容偏向。官員基於征伐或統治的政治考量而記載與議論，逐臣遷客為抒發鬱悶與寄託情志而創作詩文，壯遊者尋幽訪異後而付諸筆墨。他們的作品一方面成為地方治理乃至中央政策制定的參考資源，一方面更持續累積，相互參照或襲用，形成一個「吾輩」的心理認同；而他們在文本中往復交織的「西南知識系統」，姑不論其正確性，也深

¹²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2005年第1期（2005年1月），頁72-78。馬孟晶也提到晚明對地理知識的興趣增加，旅遊風氣興起，同時出版普及，故地理書籍甚多，包括方志、輿地、旅遊書籍等，成為傳播地理知識的媒介。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第24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99。

¹³ 「內部他者」是王明珂提出的重要概念，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深作用於漢文文學中的西南意象，以及通俗想像中西南風情的塑造，影響力至今不衰。然而，這一類型的作品，因為至少在表象上提供知識資訊，傳統上總被放在紀實的天平上審視，所以或者被視為可利用的資料庫，又或者因其考據失誤的問題受到懷疑，被排除於「信史」之外。或因如此，明清文人的西南敘事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近年來這個現象有所改變，特別是人類學界以新的視野重新閱讀明清時期西南相關的書寫，深具啟發性。¹⁴ 在此新的視角下，研究者面對描述「他族」文化特徵的文本，已不只視之為資料，而是看作「一種古典的民族志」，並留意對異族風俗的記載如何透露記載者的自我意象，以及「當時華夏民族主觀上詮釋何為文化上的族群邊界」。¹⁵ 然而，如何詮釋明清文人西南敘事的文學表現，則是一個仍待發揮的課題。有別於歷史與人類學的研究，知識、美感與情感的交織關係才是筆者所欲開發的討論，並企圖由此進入對明清文人西南敘事的深入研究。

在西南文獻系統性整理以及彝文翻譯出現以前，對西南文化的認識極度偏斜於漢族文人的文本。誠如學者所指出，透過漢族文人的眼光與文字呈現，空間與心理上的遙遠、民族形象上的妖異聯想，以及政治上的叛亂威脅，構成了西南地方的主要意象。¹⁶ 如此一來，討論文人的西南敘事，主體便不是西南，而是文人，或者說是西南影響下的文人。確實，對我的思考與討論而言，文人文本中的知識資訊是否可以核實不是重點，甚至對其華夏中心

¹⁴ 例如，王鵬惠，《族群想像與異己建構：明清時期滇黔異族書寫的人類學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王鵬惠，《失意的國族、詩意的民族、失憶的族／國：顯影民國時期的西南少數民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¹⁵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49-50。

¹⁶ 張軻風，〈異樣的目光：明清小說中的雲南鏡像〉，《明清小說研究》2012年第4期，頁17-28。本文主要處理小說中雲南的形象，但實可擴大為西南地方的形象。



思維方式的批判也不是核心。毋寧說，我希望探索的是西南自然及文化環境對明清文人文學心靈的作用，亦即前者如何刺激、誘發後者的反應，而後者又如何賦予前者文本化的表現，並烙印於普遍的文化想像之上。而作為文學研究者，我更重視的問題是如何在「西南敘事」這個設定中進行文學性的詮釋；更進一步說，文學詮釋對歷史學、人類學已然建立的堅實詮釋範式，是否具有核心的意義。文學是情與志的抒發，是想像、虛構與實用、真實的雙人舞，¹⁷ 是面向生命的方式，是人與人、人與萬物、人與歷史的扣樞，也是修辭的藝術。凡於文本幽微處，細細推究文本所傳達之情意、音聲、畫面，乃至於氣味、觸覺的聯想，探求文字深處的人情物理、心靈糾葛，自是文學的詮釋。文學研究者所倚賴者，當是這種文學的感知與敏銳（sensitivity）。惟其求諸文學感知，才能在文本的說與不說之間，超越文字的表象，以剖析西南敘事的複雜性。浸潤於文學感知的詮釋，與歷史考證、田野深描、理論建構的互相辨證，誠應是當代人文學科互跨並琢磨研究範式的努力方向。

情感與世界

本書除第七章作為代結論外，分為三大部分，分別處理明清文人西南敘事的不同面向。第一部分「情感與世界」，指向閱讀西南敘事的可能角度的兩端——直探文人內心幽微，或者放眼西南邊域與明清新世界觀的連結。創作者的情感與傳達給接收者的方式，乃是文學詮釋的核心，並不因為事涉帝國邊緣與非漢族群便失去重要性，這是貫穿本書的基本信念，因此在第一章我首先

¹⁷ 「實用」的意義長久以來被排除於文學討論之外，但最近柯慶明挑戰這一成見，正視實用文類的美感表現。參見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帶入特別重視情感與藝術表現的清初作家陸次雲。陸氏有關西南地理與文化的《峒谿織志》一書常常為人引用，例如深入西南「苗寨」而遊走於苗漢之間的漢人被稱為「漢奸」，此說便出於《峒谿織志》。然而題為「織志」，一方面要求讀者將本書置入志書的脈絡，一方面「織」之一字突出作者私人的眼光與意志，蓋不只是形容其篇幅短小而已。因此，我們實不必也不可只將《峒谿織志》作為有關西南的資料來使用，而應探究情感如何在西南這個情境生發與作用，又如何通過志書這種實用文體表現。至於以遊記、傳記等為名的作品，尤應發掘其中的情意深度與藝術表現。相對於內向的探索，西南在帝國之地理與文化上的邊緣性又須放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尺度來思考。近年來學界對「中國」的界限以及中國人世界觀的演變，做了許多考述與反省。¹⁸ 拜此之賜，我們了解到中國人的世界觀雖然在晚清時期受到巨大的衝擊，但在此之前亦並非紋風不動，而所謂「華夏」更非亙古自明。當我們將眼光集中於晚清，自然有感於十九世紀後期的中國如何在強勢的西方文明壓力之下，被迫重新認知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¹⁹ 然而，如果拉長時間軸，正視明清時期歷史發展的多重面向，那麼正如葛兆光所注目者，晚明時期在西洋地理知識的影響下，特別是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萬曆十二年即西元 1584 年問世），²⁰ 以及其後的《坤輿萬國全圖》，²¹ 中國人的觀念世界已

¹⁸ 著例如陶晉生的《對等：遼宋金時期外交的問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年）；葛兆光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與《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

¹⁹ 例如最近臺灣研究晚清文學的顏健富即強調這個從傳統天圓地方的天下觀轉向為萬國世界觀的面向。參見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²⁰ 利瑪竇在中國期間，曾繪製多種世界地圖。最早者即為 1584 年他在廣東肇慶時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圖今不傳。參見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3-11。

²¹ 此圖為利瑪竇到北京後所製。同前註，頁 30-33。



然由「天下」向「萬國」推移，改變了傳統的由中心向邊緣次第等降的文明空間觀，而在此之前，不論佛教世界觀的傳入，或蒙元的統治與擴張，皆未曾造成如此根本的影響。²²不但如此，許多文本也讓我們發現，雖然康熙以後的清王朝長期背負著對西方世界封閉的惡名，但知識界對廣大世界的興趣其實並未消失。地理知識與異國或異族文化仍令人津津樂道，即使往往成為出版市場的娛樂賣點與跨階層的實用或消閒讀物（例如日用類書），但這種「好奇」之心，仍應視為一種向外開放的眼光。這種「好奇領異」的開放心態在清代雖然有所限縮，但並未封閉，而仍然潛流作用，隱約呼應著晚明清初開啟的萬國意識，也（錯軌地）連接到晚清以降的世界秩序觀念的重組。並且，我認為對明清時人來說的「外界」或「異域」，不應由二十世紀以後的後見而固著於現代中國領土以外的國家。對明清時人而言，帝國的邊域在政治、風俗諸多方面都時常與王朝拉鋸游移，內外在地圖上可以強為劃分，但在觀念上並不能尺度線裁。因此，對邊域的書寫，一方面是帝國內部的探索，一方面則連結、延展、散發為對廣大未知世界的興趣。這應是閱讀《峒谿織志》這類作品的歷史脈絡。我們亦不難由陸次雲的其他編著作品發現，這種眼光向外的好奇意志不斷擴散，最終將晚明以來的新興地理知識與對渺遠異域的想像交錯呈現為一好奇領異的世界。換言之，晚明的好奇之風在清代未曾斷絕，而且仍牽動文化視野的開放性。與此同時，我們也觀察到陸次雲以及一些同時期的文人，喜於地理及文化上與王朝中央有距離之處，探索人們的情意內涵及其表達方式，並與自己的情感做連結。例如陸次雲對「跳月」婚俗的細膩描寫，不僅記錄衣飾、動作的細節，更以介入且帶感情的眼光觀察，並揣測跳月男女的情意交流，將之詮釋為自然造物的表現。又如清初吳

²²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33-39、49-52。



淇在任職廣西期間蒐集當地民族的歌謠，編為《粵風續九》一書，其後在若干代表性文人間流傳或受到引述，背後的動力除了「好奇」，也是因為他們相信情感具有普遍性，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與民族間流動。而用以傳達情感的音聲，雖然語言相異，音樂相殊，卻可以透過「翻譯」而達到某種程度的理解與交融。誠然，文人對西南邊域之風俗、音聲、情感的敘寫，處處洩漏著漢人的目光與情感的代入，但其編寫的文本對帝國疆域內的異質性進行文化的「翻譯」，仍舊意指對文化的歧異、非同一性的認知，乃至對世界的探索精神，而這種相對開放的心態也帶來重審自我的可能性。

由觀察西南文化與風俗之異，而反看地理上的「中原」或文化上的「華夏」，不乏其例。其中最具戲劇性的例子，當是清初文人陳鼎的《滇黔土司婚禮記》，這也是本書第二章的討論重點。陳鼎活躍的時期約略與陸次雲相當，然而，不同於其他書寫西南的漢人作者多採取置身其外的敘事角度，陳鼎則刻意將敘事者置身其內，以致他的敘事觀點在內外間往復跳躍，文學趣味盎然。由於此作品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一漢人長期居留滇黔，最終與當地土司結親的過程，而且對西南文化與習俗的描寫極盡細節，因此常被視為第一手觀察的史料。然而，正如陸次雲的《峒谿織志》因為兼具知識與娛樂的性質，在出版市場上曾頗受歡迎，陳鼎的作品亦不能單純理解為「個人回憶錄」。明代以來，邊域與外國的地理知識吸引許多人，也刺激作品的產生與接受。其中，有些是受到鄭和下西洋以及海洋朝貢體系的影響，使得明人對有關南洋（東南亞），以及印度洋、阿拉伯半島（當時所謂「西洋藩國」）等地區的知識發生興趣，因此出現馬歡紀錄隨行鄭和的《瀛涯勝覽》（十五世紀）、費信的《星槎勝覽》（又名《大西洋記》，十五世紀）、鞏珍的《西洋番國志》等海外見聞紀錄；



另一方面，明代旅行家如王士性、謝肇淛、徐宏祖等人則探索境內，行跡遠至邊地，記錄一手資料，同樣提供讀者地理與其他文化的知識。²³ 當知識寄託於書本，現身於書市，便不僅是頭腦的活動，也是交換、交易與物品的流通。正如何予明所指出，在十六、十七世紀，來自都市與全國的文化物品都可成為被個人擁有的家居消費品。²⁴ 作為可消費的文化物品，某類書籍在出版市場上為讀者接受，自能刺激生產。陸次雲的《峒谿織志》也好，陳鼎的《滇黔土司婚禮記》也好，都是篇幅相對輕薄，而且結合獵奇的趣味與一定的知識性的作品，他們都是因應出版市場對地理知識的需求而產生的。事實上，到了乾隆後期的一七八〇年代，當朝鮮人朴趾源隨使節來到清國，陳鼎的作品仍列在他訪書、蒐書的書單上，²⁵ 於此可見陳鼎在書籍市場上一直具有吸引力，且名聲達於朝鮮讀者。²⁶ 因此，以第一人稱自敘的《滇黔土司婚禮記》不能作為紀實資料來讀，而應注意作者很可能一開始就考慮書市的接受度，促成其敘事具有揉雜歷史軼事、習俗觀察、想像虛構的多元異質。書中的敘事者自稱自幼隨親到滇黔後，居處多年，擔任土司府的塾師，後與土司之女結親。這當然設定了一個極為特殊的敘事角度。陸次雲曾指出，漢人越過漢苗界線，深入

²³ Benjamin A. Elman, "Ming-Qing Border Defense, the Inward Turn of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Qing Expansion in Central A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pp. 32-33.

²⁴ Yuming He,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p. 247.

²⁵ 朴趾源曾提到陳鼎所著《留溪外傳》中的孝子故事；又，在「口外異聞」一節有「蠻語」一段，雖未註明出處，但其實取自陳鼎的著作。參見朴趾源著，朱瑞平校點，《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年），頁131、290。

²⁶ 《熱河日記》引述陳鼎記錄的「蠻語」，這表達了當時朝鮮讀者對中國書籍中有關「邊疆」地區與非漢文化的部分，也抱持高度的興趣。當然這又是另一個議題了。



苗區，與苗人接觸交涉，甚至融入苗人生活的，稱作「漢奸」。²⁷這麼說來，《滇黔土司婚禮記》的敘事者無疑是一個「漢奸」。這個人物設定為因為父親早逝、貧窮無依、明清易代等因素而居滇黔，然而更有意義的是，他的案例代表明清時期在漢、苗之間的「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將越發明顯甚至擴張。所謂「中間地帶」，指的是在中國王朝的制度、文化、秩序間歇性地向邊域擴張的過程中，發生激烈的經濟交換、跨族群婚姻、文化互動、彈性認同的地區。²⁸在中間地帶發生的接觸，遠較旅行人短期間對當地社會文化的表象所做的觀察為深刻，而且尤為重要的是，這種接觸必然在彼此間促生複雜的情感——愛與恨，羨賞與厭棄，認同對方與回視自身，種種情思交錯糾纏。在《滇黔土司婚禮記》中，這種情感作用的對象正是敘事者的原生文化與歷史，而又投射回來，主導了他對異文化的觀察與理解。

戰爭與統治

文人的西南敘事以情感為中心，知識系統圍繞著好奇的精神而構成，而奉派到西南的王朝官員則有完全不同的視野。身負任務的官員，帶著特定目的的眼光進行觀察與書寫，其敘事自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不論官員的政治任務是征服土地、平定動亂，

²⁷ 陸次雲，《峒谿織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史部第256冊，頁139。Donald S. Sutton進一步指出，「漢奸」一詞後來附加了價值判斷，用來指稱那些一方面涉入法律案件，挑戰政府權威，加入叛亂活動，一方面又利用苗人，奪取其土地財產的漢人。也因為如此，政府更加主張分離制度（quarantine）。參見Donald S. Sutton, "Ethnicity and the Miao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 193-195。

²⁸ C. Pat Giersch, "A Motley Throng: Social Change on Southwest China's Early Modern Frontier, 1700-188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1 (2001), pp. 67-94.



或者治理邊疆，其視角少有例外地由外部出發，且自上視下，其觀察與理解則明顯為政治目的服務，而非僅是好奇與求知。這一類型的西南敘事往往寓含外來者以征服、統治的立場而施加於此的政治暴力，然而這並不是說西南地方未曾相對地發生影響，改變外來者的認識與心態。本書的第二部分「戰爭與統治」便處理這一類型的西南敘事，並分別討論「鎮壓戰亂」角色與「戰後撫治」角色的書寫。如眾所周知，對於明清時期的中央王朝而言，西南地區的政治定位其實是浮動的。如學者所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延續性的中國」很早就已出現，在秦、漢時期已經形成政治、文化、語言上相當同一的中華帝國，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在一般觀念世界裡少見所謂「外國」意識，一直到宋代，處在多國國際環境中，才開始產生「中國」意識。²⁹ 也就是說，「中國」是一在相對關係中才能形成的觀念。直到蒙元時代官修《宋史》，才第一次在「列傳」中同時設有「外國傳」（包括大夏、高麗、交趾、大理、占城、天竺、流求、日本、吐蕃……等國家）與「蠻夷傳」（主要便是西南地區「諸蠻」與「諸夷」），架構了外與內的明確分別。³⁰ 由此可知，對宋人而言，西南「蠻夷」不是「外國」，仍是屬於疆域「內部」的地區與部族。然而，雖然定義為「內部」，卻是一種不斷游移的「內」，既是對「外」（外國）的屏障，又是對「內」的威脅，同時具有由內轉外的可能性。嚴格說來，此一時期的西南「蠻夷」與中央亦不過一種羈縻的關係，或可比做大國與小邦。相反的，「外國」亦未嘗沒有進入內部的可能，例如「大理」在蒙元時期及其後便成為版圖內的雲南地區，不再列為「外國」。在明清時期，西南邊域內與外的游移未曾消

²⁹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4-6。

³⁰ 同前註。亦可參見錢云，〈從「四夷」到「外國」：《宋史·外國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論文，2015年）。錢云指出，《宋史》雖是元代所修，體現的實是宋人的知識與觀念。



停，征伐與治理交相運作，所爭的正是內與外更明確的界線。這是政治的邊界，但亦如邊疆研究的學者指出，民族區域的界線往往也是一種邊界。³¹ 戰爭中與戰爭後，如何處理政治及文化的邊界，也是本書第三與第四章分別討論的問題。

第三章的主人翁是明代嘉靖年間在廣西參與大藤峽戰役的田汝成，第四章則是清初三藩戰後到貴州進行重建的田雯。他們留下的西南敘事文本——《炎徼紀聞》與《黔書》，雖然都不以「志」為題，但其實一如陸次雲的《峒谿織志》，都可劃歸私人方志的類別，只是這兩者的意圖顯然政治性更強。方志記錄地方（常常是行政區域）的歷史與現狀，是中國特有且重要的文本類型，一般作為歷史地理學的材料來看待。然而，既是一種悠久宏富的書寫類型，自然屬於傳統「文」的範圍。我們若不自限於二十世紀以後受西方影響的「文學」觀念，則方志不無作為文學解讀的可能，而方志中的山水志、藝文志等次類別，以及可以表現纂志者個人性的私人方志，尤其如此。有明一代，方志在萬曆年間達到極盛，根據分析，這與地方的仕紳社會興起有關，也就是說，曾通過地方考試之士人的力量擴張，仕紳開始積極介入地方事務，致力於提升鄉邦的地位。而十七世紀晚期以後方志熱潮再起，則是與清朝統治下的秩序重建有所關聯。³² 田汝成與田雯的私人西南方志當然不在鄉邦文化的範圍內，因為他們的身分都是外來者，然而兩者卻都與帝國的秩序有關，儘管一個要以軍事力量扶明朝大廈之將傾，一個要以制度、學校、產業鞏固清朝的邊域。誠然，對官員而言，奉派西南絕非值得欣慶之事，然而明清時期確實有很多官員必須擔負這樣的任務。如學者所分析，如此幅員

³¹ 馬大正、劉遜，《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頁42。

³² 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pp. 32-33.



廣大的帝國，鎮撫邊疆必然造成中央政府極大的財政負擔，而官員派任又有「迴避」制度，以使官員不受制於家鄉的地方感情（geographical loyalties）而施政偏私，兩種因素相乘，便造成許多官員在薪俸有限的條件下必須遠離家鄉，赴邊疆任職。也因為如此，明清的政治討論往往對邊疆充滿疑慮與厭恨。³³ 那麼，在普遍的疑懼中，田汝成與田雯的經驗有何特殊性，其敘事又可如何詮釋呢？

田汝成的《炎徼紀聞》的基礎是作者在戰役中的所見與所聞，除了描述他認識的西南歷史、地理、種族、文化，作為主政者的參考外，特別引人注意的應是集子中大量的人物事跡與戰役報導。雖然其事未必是田汝成親身經歷，但他以全知的敘事筆法，描述人物心理與事件細節，效果極佳，因此一再為後人引述，成為西南敘事的經典之一。田汝成之所以描述西南的各種細節，表層的理由自然是作為征伐與統治的參考書，但是對事物的興趣以及敘事的趣味是更強烈的動力，這也是其文學性的來源。田雯於三藩戰後擔任貴州巡撫，面對戰後的殘破，任務當然很艱鉅。他在貴州期間，親自查考、蒐集當地的民族、風俗、物產，同時也訪山問水，親近自然景觀。歷代多種西南方志往往大篇幅抄錄前人著述，《黔書》雖亦不免抄錄的情況（特別是對貴州各民族的描述），但作者個人的觀察、體驗、感受才具有籠罩文本的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雖是私人方志，以提供治理參考為名，《黔書》卻也是田雯的文學實驗場。所謂文學實驗，指的不只是煥美的文采經營，更是詩人的眼耳身體面對異地的自然與人文挑戰，從而試圖以文字表現心理在抵抗與接受間的掙扎。例如，他嘗試以超過五言、七言形式限制的九言詩形式，表現超大尺度山水帶來的

³³ Alexander Woodside, "The Centre and the Borderland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in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pp. 11-28.

震懾與壯美經驗。因此，審美經驗與志書形式，竟能同時呈現。

最初出於政治目的而寫的《炎徼紀聞》與《黔書》，都具有很高文學價值，作者作為征伐者與統治者的身分，其實更增加了其書寫的層次。在反省方志傳統時，王明珂曾指出這是「規範人們歷史記憶的文化結構」的一種例子，當其發展成熟，則不論書寫、編修、接受都有一定的範式，延續穩定的社會記憶。然而，當文人身處「帝國邊郡」，規範與約束的力量削減，反而有可能違反方志的文類規範，選擇或創造不同的記憶與認同。³⁴ 誠哉斯言。《炎徼紀聞》與《黔書》確實應該放在這樣的脈絡中閱讀。此外，雖然並非本書討論的重點，但兩位作者在邊疆政策上的主張各有重要性。如果只看表面文字，田汝成讀來是個強硬的主戰派。他對西南戰爭的觀察與記錄，包括從韓雍到王陽明的指揮統領，提出了很多批評，尤其反對王氏放棄斬草除根的主張。正如 David Faure 的分析，明代廣西發生多次的瑤族動亂，表面上被明朝政府「平定」，事實上明朝的「勝利」非常模糊。³⁵ 田汝成的敘事對此提供了第一手的觀察與看法。另一方面，作為戰爭之後的敘事，《黔書》仍要突顯貴州的戰略位置。John Herman 便指出，吳三桂試圖廢除貴州水西土司，改行直接統治，但並未成功，而當田雯對貴州進行精密的地理、農業、礦產與民族分布考察，背

³⁴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5年），頁132-133、157。

³⁵ David Faure, "The Yao Wars in the Mid-Ming and Their Impact on Yao Ethnicities,"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 179. Faure 分析的包括 1465 年的大藤峽之役，以及 1526 年、1537 年的戰役。



後的政治臺詞乃是要更積極地將貴州納入中國內部。³⁶ 不過，田雯較為務實，他雖然想要盡量消除貴州在帝國內、外之際的游移，但考量中國的「利益」（profitability），便主張在漢人區域施行省級行政，在非漢地區則仍然任用土司。³⁷ 以上所述這些歷史學者的分析，說明田汝成與田雯的西南敘事，就軍事與政治而言都表現了深刻的洞見。政治見識與文學審美，在此交互作用，相輔相成。他們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相似處，則是在西南敘事以外，分別又為自己的家鄉寫作私人方志。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與《志餘》，可謂最有影響力的西湖地理與文化志；田雯的《長河志籍考》雖然名氣不若，仍被視為康熙以後山東德州志書的正統。這種西南邊域與家鄉的雙重書寫，可說見證了明清文人的地理興趣，回應本書第一部分提出的觀察。

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

本書的第三部分轉向「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的議題，以具體的例子討論女性、身體、婚姻習俗等等主題如何在西南敘事中成為政治協商與道德論述的象徵符碼，不但發揮歷史的關鍵意義，甚至挑戰華夏單一正統的觀念，詢問文化多音的可能性。前面已經提到，土司是西南地區標誌性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以治邊的思維來看，用不同程度的羈縻來維繫與不同周邊的關係，可說是非常務實的作法。承認西南地區的土司統治，就是一種羈縻的形式。不過，羈縻的近程目標是保持中國與周邊的政治聯繫，

³⁶ John. E. Herman, "The Cant of Conquest: Tusi Offices and China'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58-160.

³⁷ Ibid., p. 160.



但最終目標仍是要實現「更高層次的治理」，³⁸也就是中央的直接統治。在明清的脈絡中，就政治而言，這就是長期的「改土歸流」的努力；就文化而言，則是各種「用夏變夷」的論述。雖然傳統的邊疆觀，或說治邊論，多以夷夏之防為準則，以大一統思想為基礎，³⁹但相對的，地方自然也有不同的對應方式，以維護自身的利益、地位與歷史意識。因此，整個明清時期，西南都處在中央與地方政治勢力不斷的角力、拉鋸、協商過程中。又可以說，西南邊疆從元明的土司統治到晚明以至清代的流官統治，自中央的眼光看來，即是「化外」絕域轉化為帝國的一部分，而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便是由非漢族群居住的經濟落後的鄉野邊疆，變為逐漸商業化的城市中心，且為漢人移民聚居地的地區。⁴⁰在這長期的「進入帝國」的過程中，西南民族的土司制度逐漸轉向中央主導的州縣制度，引發了不計其數的地方抗爭與中央鎮壓，實質上便是國家認同的問題。⁴¹近期，也有專門研究西南問題的學者提出，學界熱烈討論的華夷、內外等概念，其實不足以解釋中央王朝與邊域的關係。他認為，不如回頭使用若干舊有的詞彙，例如異域、羈縻、新疆、舊疆等等，更適合描寫中央王朝向邊緣

³⁸ 馬大正、劉遜，《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頁49。

³⁹ 同前註，頁46-48。作者並指出，治邊的實踐可分為「多事四夷」（武力征服繼而穩定統治）、「守在四夷」（四夷成為中央的保衛）、「以夷治夷」（以華化較深之夷制華化較少之夷）等層次。

⁴⁰ John. E. Herman, "The Cant of Conquest: Tusi Offices and China'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 135.

⁴¹ 葛兆光便指出，大清帝國版圖逐步擴大，包括雍正實現了「改土歸流」，使得西南苗、彝由土司土官治理變成國家控制的州府縣廳，形成了內部族群的國家認同問題。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6-11。葛兆光強調清代的擴張使內部認同問題更形嚴重，然而，此一問題自然不是清代所獨有，明代也已經相當明顯。



地區拓展的歷史中，兩者之間的動態關係。⁴²這確實也是值得重視的看法。畢竟在如此漫長的數百年間，何地為異地，何人為異族，彼此的認知都隨著時代、事件、人物而變化，不但界線無法清楚劃分，中央王朝的擴張與邊緣地區的抵制之間的進退拉鋸也不能一語道盡。因此，探討此一競爭與協商過程中的書寫，理應轉換視角，盡量同時考慮中央與邊緣的思考。

本書的第三部分，第五章討論的是明代嘉靖以後，在面對西南邊域的動亂時，如何回溯「國初」拓展疆域而與地方土司進行的政治交換，這樣的記錄又如何通過文學經營，發展為女英雄的國家寓言，見證性別與歷史的交會。土司制度是西南研究的重點，專業性很強，精深的討論非筆者能力所及。借用學者的分析，簡單地說，朱元璋承襲元代的西南土司制度，形成文職土司與武職土司兩種系統，武職為主，文職為輔。⁴³所謂土司的文武之別，文職土司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其所轄與行政區域重疊；相較於明代以前的「羈縻」，文職土司轄制地域的漢人移民較多，經濟較發達，漢人影響較強。武職土司的地區自治性較強，所轄地區往往不在省區，或在省區邊緣，如貴州西北的「水西」，四川南部的「大涼山」等等。武職土司名義上效忠明政府，承諾防禦外國侵略，並且定時進貢，但享有法律與習俗的自治權，因此比較像是唐宋時期寬鬆的羈縻地區。⁴⁴可以想見，武職土司控制的地區，與中央王朝的關係更為緊張、複雜。第五章討論的兩位

⁴² 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310。

⁴³ 李曉傑，《疆域與政區：地圖上的中國歷史》（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頁190-191。

⁴⁴ John. E. Herman, "The Cant of Conquest: Tusi Offices and China'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36-137.



明代女土司，正是這種武職土司。早在南北朝時期，嶺南地區的俚人女首領冼夫人就曾炎威赫赫，聲振中國。元代李京在《雲南紀略》中也特別提到，西南地區的土司夫人稱為「耐德」，夫死子幼，耐德可以繼位。⁴⁵ 這條紀錄後來不斷為各種志書、苗圖所複製，廣為流傳。明初的奢香出身四川土司，與貴州的「水西」地區土司成婚後，統治當地的羅羅，也就是彝族；明末協助中央政府鎮壓播州之亂與農民／流寇的秦良玉，控制的地區則是蜀中的石柱一帶。分處明代首尾的兩位西南女土司，在中央王朝與漢族的視線下，被詮釋為開國與救國的象徵，實在是非常有趣的現象。其實，奢香所屬的貴州西北的彝族，很早就建立了國家，而且至遲在宋代已有成熟的文字，留下大量以文字書寫的文獻，其內容包羅萬象，自成一套與漢文文獻不同的關於本地歷史的解釋。⁴⁶ 因此，這是一個既有獨立的政權，又有完整的歷史文化認同的羅羅國。奢香的部族長期與中央王朝發生交涉，他們的動向更對王朝命運發生重大的影響。暫且不提三國時代蜀國對西南夷的征戰，近在與奢香相距不過約八十年左右的元成宗時期，因雲南行省左丞劉深率元軍征伐八百媳婦國，途經貴州，徵掠太過，女土司奢節（《元史》作「蛇節」）便曾聯合水東土司宋隆濟，領導反抗元軍，造成整個西南地區為之震盪，致使元軍最後放棄

⁴⁵ 李京撰，王叔武校注，《雲南紀略輯校》（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頁90。

⁴⁶ 彝文典籍數量極為可觀，至今整理出來的部分匯編為《叢文叢刻》，另有《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影響當代研究深遠的巨幅資料。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頁8-9。



對八百媳婦國的軍事行動，劉深亦被誅。⁴⁷奢節事件的始末告訴我們，蒙元雖然在貴州設行省，但對羅羅國仍不出羈縻的關係，如果中央王朝意圖拉緊這條關係線，或邊域的彝族政權嘗試切斷這條線，那麼雙方都會付出極大的代價。當奢香的丈夫靄翠決定依附新立國的明朝，他們與新的中央王朝的關係並沒有改變，仍舊是一羈縻的狀態，這也就是奢香故事的背景。明王朝希望加強對水西的控制，達到直接統治，水西則希望繼續維持自治。對水西而言，這是一次決定命運的外交談判，而進與退的政治藝術正是奢香故事在傳述過程中敘事趣味之所繫。然而，這次政治談判的效力並非恆久，而水西與中央王朝的關係經常處於不穩定的狀

⁴⁷ 相關事件可參照數種史料勾勒出來。《元史》在〈成宗本紀〉中提到西南「諸蠻」不輸稅賦，因此發動征伐，因戰事不順而罷征八百媳婦國，收回劉深的符印驛券，後由劉國傑裨將宋光率兵大敗蛇節。見宋濂等修，《元史》，卷20，〈本紀〉第20（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442-443。〈哈剌哈孫傳〉則記述劉深倡議征伐八百媳婦國，哈剌哈孫反對，成宗不聽，而劉深兵到順元時，「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於窮谷，首尾不能相救」，後來平章劉國傑來援，斬蛇節，但軍士已十不存一二。見《元史》，卷136，〈列傳〉第23，頁3293。〈劉國傑傳〉也提到大德五年「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見《元史》，卷162，〈列傳〉第49，頁3812。〈陳祐傳〉（陳祐一作「陳祐」）則詳述陳天祥上章論征西南夷事，嚴厲批評劉深主張征伐西南之不當，而且揭發劉深欺上罔下，在西南地區「縱橫恣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見《元史》，卷168，〈列傳〉第55，頁3948。另元代的黃潛（1277-1357）在敘述此一事件時，特別提到「蠻酋蛇節（即蛇節），水西上官阿那之妻也，有權略，蠻咸聽其命。」見《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69冊，頁251。許有壬（1287-1364）則指出折節（即蛇節）「健黠而能兵」。見《至正集》，卷48，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211冊，頁347。以上二則元人的敘述都強調了女土司本人的領導能力，值得注意。今人對此一事件的梳理重述可參見羅友林，〈元代貴州宋隆濟、蛇節起義〉，《貴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頁97-104。奢節現在被尊稱為「烈姬」，成為彝族的民族女英雄。其現存的墳墓未考何時所立，上面所刻的聯語：「欲鑄紅顏成黑鐵，獨留青冢向黃昏」，亦未考何人、何時所作，但用的卻是漢家女兒昭君魂留異域的典故，可說是一彝漢歷史詮釋交錯的例子。有關這一事件以及其詮釋，我已有專文「The Female Chieftain's Tribute」探討（未刊稿）。



態。晚明時期，奢香的後人奢崇明與奢社輝發動戰爭，對王朝造成嚴重的破壞，在史家的後見之明看來，實在其來有自。所以第五章後半所討論的清初劇本《芝龕記》，才會安排女土司奢社輝上場自報家門說：「女祖當年闢貴龍，羅施累代逞威風。」亦即自稱繼承了祖先奢香未竟的事業。換言之，在奢香故事中，我們看到西南非漢民族為了強調自己的「他者性」，以妥協與堅持並行的方式維護苗漢的界線，⁴⁸而中央王朝亦須做出相應的決策。

《芝龕記》是一部清初作者思考明末歷史的劇作，作者的歷史詮釋與道德判斷相對明確。劇本圍繞著兩位女英雄的生命發展，而其中一位正是四川女土司秦良玉。既是清代的作品，秦良玉晚年抗清的部分自然必須稀釋，而強調她協助鎮壓奢香後人參與的「奢安之亂」，以及之後與張獻忠、李自成抗爭，等於間接成就了清朝接續為正統王朝。女土司在歷史上的實際作為固然有許多可以徵實，但是歷史形象卻往往是在文學作品的層層書寫下塑造出來的，而這又與不同歷史時期的意識框架與敘事脈絡有關。這個交錯的過程，女土司的歷史與文學書寫極為豐富地呈現出來。

本書以西南敘事為主題，處理的文本並不限於狹義的小說，不過，第六章探討的作品則確實是兩部長篇小說。這兩部小說都藉由西南敘事建構了特殊的世界觀，並且在華夏文化中心主義的強烈修辭下，通過小說這一文類的多音本質，陳倉暗渡了對文化多音的想像。作於乾隆時期的白話小說《野叟曝言》有部分情節講述主人翁於明嘉靖年間在廣西與當地民族接觸的經驗，乾、嘉之間的文言小說《蟬史》則主要敘述清朝大將與貴州苗族的戰爭，

⁴⁸ 維護苗漢界線，乃是面對中國王朝的擴張與國家建構所做的反應。學者發現，非漢族群積極利用苗的「他者性」（otherness）來形塑自己的認同，如蚩尤傳說、苗王傳說、苗亂等。Siu-woo Cheung, "Appropriating Otherness and the Contention of Miao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3.2 (2012), pp. 142-146。



兼述征伐交趾與臺灣。這兩部小說都表現強烈的華夏中心意識以及文化擴張主義，所以，就第一層意義讀去，必然令有現代反省精神的讀者心生不悅。換言之，我們可以輕易將這兩部作品作為漢族沙文主義的負面標本而嚴厲批判。不過，文學的世界並非如此黑白分明。《野叟曝言》與《蟬史》都是既表達中國觀，又對變化中的世界觀有所回應的作品，而這與清代的地理知識的發展與轉向有直接關係。前文曾提到，學者早已爬梳過中國地理觀與世界知識的發展，簡單地說，十六世紀耶穌會士的工作增益了明代文人原有的地理知識，正是利瑪竇自 1584 年到 1602 年間先後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輿地山海全圖》、《坤輿萬國全圖》等諸多版本的世界地圖使中國人理解歐洲的正確位置，也促使許多文人修正其世界觀。中國自己最早的世界地圖是《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1593），但此圖仍以中國為世界中心。艾儒略（Giulio Aleni）與楊廷筠所作的《職方外紀》已經是世界地理學著作，在清代的影響力甚至大過利瑪竇的地圖。然而傳統方格式地圖在清代仍然較為流行，例如黃宗羲在康熙十二年（1673 年）所製的「天下全圖」，便為其孫子黃千人發展為《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⁴⁹，後來又演變為《輿地全圖》（嘉慶四年，1799 年）⁵⁰等。另一方面，康熙使法國傳教士繪製精密的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在各方面都超越了前

⁴⁹ 有關《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可參考臺灣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資料庫，<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queryxml?0:0:npmrbxml:000029525>。

⁵⁰ 有關《輿地全圖》，可參考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的介紹，參見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45。此圖右下方「圖例」註明乃參照康熙癸丑年（十二年）黃宗羲編製之「天下全圖」。



代的水準。⁵¹ 那麼，中國對世界的態度是否隨著地理知識的發展而改變呢？Benjamin Elman 指出，雖然自明至清，世界知識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但十七世紀後中國的地理學出現所謂「內轉向」，也就是說，考證學者將地理知識「內部化」（domesticate），許多地理著作專注於內部問題。當清代學術對世界知識的興趣降低，地理之學便轉向區域性的軍事策略與地方及海岸防禦，而攻下臺灣後，王朝的興趣更轉為朝向內陸的擴張。⁵² 這樣的說法近期受到一些挑戰。例如，賴毓芝在研究乾隆朝《職貢圖》時發現，該圖第一卷描繪的意象是萬國來朝帝都的形象，用意似乎與傳統職貢圖一樣，然而，乾隆朝《職貢圖》中西洋諸國所佔比例大幅提高，而且，仔細分析，此圖所表現的「世界」，若與《明史》或晚明的類書《三才圖會》相比，不論國家數量或描繪的精確，都出現「西洋的轉向」。也就是說，圖中指涉的「西洋」，不再像明代指的是南中國海周圍國家，而是現代意義的歐洲各國。賴毓芝認為，此圖顯示歐洲各國「正式進入中國所結構的世界體系」。⁵³ 「內轉向」與「西洋轉向」，Elman 與賴毓芝的觀察似乎矛盾。不過，二者其實未必對立，而應同時放在盛清的一統思考框架中理解。如前所述，從「天下」到「萬國」，這是近代中國世界觀變化的軌跡；然而，正因身處萬國之中的體認，這才使得內部問題更為重要，而邊疆政策更為積極。⁵⁴

⁵¹ 以上有關中國地理觀與世界知識的概述，取材於 Benjamin A. Elman, "Ming-Qing Border Defense, the Inward Turn of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Qing Expansion in Central A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pp. 34-39。

⁵² Ibid., pp. 39-41.

⁵³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5 期（2012 年 3 月），頁 21-44。

⁵⁴ 學者指出，傳統治邊思想主張夷夏之防（即防止以夷變夏），但明清以後，隨著中外關係成為新的邊疆問題，以華變夷便成為積極的治邊思想，且以大一統思想為基礎。馬大正、劉遜，《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頁 46-48。



原先，清代前期對西南的政策，滿人傾向分離主義與間接統治，漢人官員則傾向儒學教化。乾隆尤其反對對苗地進行積極的「王化」，主張讓苗人維持苗俗，堅守漢苗分離，而漢人官員仍致力推行儒學基本教育與同化政策。朝廷與地方官員態度雖似矛盾，其實都顯示邊疆的改變已不可阻擋。⁵⁵ 學者且以陳宏謀（1696-1771）為例，指出陳宏謀在地方上的教化大業雖然一開始並不成功，但他第二次任湖南巡撫時，仍再次推行積極教化與同化政策；其他的地方官員更進一步推行，同時力求「苗俗」如跳月等不能影響漢人婚姻習俗。⁵⁶ 這一歷史背景正是夏敬渠在乾隆年間寫作《野叟曝言》的脈絡。小說假託明代嘉靖年間，但寄託的則是作者自身所處的時代。小說中的中國王朝以軍事及文化的力量使得萬邦來朝，服膺儒家道統，這固然是沙文主義者的大夢，但其世界想像卻有時代背景，也就是乾隆時期的全球視野，回應前文提到的世界體系的「西洋轉向」。另一方面，「內轉向」的表現亦極為明顯。小說主人翁曾壯遊中國四方，在廣西苗地與當地的土官及人民有深度接觸，因此，他所持極度放大的華夏主義也與當地文化發生直接衝突，尤其表現在婚姻習俗與男女之防的差異上。我們發現，小說面對非漢民族的教化論述有其歷史背景，也就是帝國處理內部矛盾的邊疆政策的變化；而作為漢人文人的小說作者，對儒家價值與漢人文化的普遍性抱有極大的樂觀，雖然在小說中有文學誇飾的呈現，本質上卻也與同時期的漢人官員的態度趨向一致。不過，本書論述的重點則在步步剝顯小說在看似華夏一統的文化霸權論述中，如何透過意象的暗示、人物的設計、對話的論辯等等文學手法的經營，圍繞著婚姻與男女的問題，

⁵⁵ Donald S. Sutton, "Ethnicity and the Miao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96; 204-211.

⁵⁶ Ibid.



構造了一個與華夏正統抗衡的價值體系。亦唯有小說文類的多音本質，才得以表現這種漢與非漢、華與「夷」、儒家道統與邊疆習俗之間不同價值判斷的對話、衝突以及有時發生的雙向妥協。

問題是，帝國的邊境太過龐雜，當王朝政治中心由虛構的中國中心地理觀出發，採取用夏變夷的政策，則政治中心便愈發需要以武力壓制邊疆的反抗力量，最後不免發生流血衝突；正是由於王朝試圖將原本變動、多元的邊疆世界予以統一，因而造成明清時期邊疆地區諸多的戰爭殺戮。⁵⁷《蟬史》就是這一武力衝突脈絡與作者個人主觀意志交相作用的產物。《野叟曝言》倡言儒家教化，《蟬史》則主張武力壓制甚至滅絕。這部寫於乾嘉之間的小說一開始便描述中國處於世界諸國之間的體認，然而此際已非萬邦來朝，而是萬國環伺，而小說影射的歷史現實，又正是大將傅鼐、福康安對中國內部矛盾的軍事征伐，特別是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林爽文事件，以及乾隆六十年的湘黔苗族起義事件。誠然，以強硬立場處理西南問題並非從清代才開始。學者爬梳中央政府對西南地區政治收編的過程，指出在十五世紀末，明人仍未將西南地區視為內地的延續，而是內部的邊疆（internal frontier）或者半周邊（semiperiphery），⁵⁸但到了十六世紀下半，明政府開始策略性剿滅貴州大土司，如貴州北部播州的楊家土司（宣慰

⁵⁷ Alexander Woodside 認為，這種一統觀來自虛構的地理觀、父權式的情感基礎，以及文化動員的雄心。Alexander Woodside, "The Centre and the Borderland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in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pp. 14-15。

⁵⁸ 當時雲南的一半，貴州的三分之二，以及整個四川南部，都不在中國的直接統治範圍之內，而是武職土司的勢力範圍。John. E. Herman, "The Cant of Conquest: Tusi Offices and China'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 137。



司)與貴州西北邊的安家土司。⁵⁹ 本書第三章討論的田汝成與第五章的秦良玉,都代表其中的關鍵。第三章指出,田汝成主張積極的西南政策,他認為中國的制度有朝一日可以經由西南而服遠夷。誠如學者所論,他的態度一方面與同時代的官員同聲相求,一方面也具有催化積極西南政策的作用。⁶⁰ 第五章討論的女土司秦良玉的記載,則正體現晚明清剿貴州土司的軍事行動。降至清代,亦發生多次苗民暴動,在《蟬史》之前,便有雍正末乾隆初(1735-1736)與乾隆末嘉慶初(1795-1807)兩次重大暴動,深層原因都是清王朝在實施改土歸流政策的過程中,強力且過於迅速地推動中央直接統治與儒家思想,於是與苗區社會的原有文化發生衝突,而漢人「客民」又與苗民爭奪土地之故。⁶¹ 因此,《蟬史》表現的強硬武力鎮壓態度,自有其歷史與當代的背景。然而,本書所要探討的,並非小說描述的軍事征伐,而是由小說以「蟬」為題所連結出來的多重「蟲」喻。何予明在討論明代流傳最廣的異國知識書籍《贏蟲錄》時,認為該書重新帶入傳統思想中的「五蟲」詞彙,而以「人」為「贏蟲」,具有遊戲效果,可以吸引書籍市場中不同階層的讀者。⁶² 本書則指出,《蟬史》的作者屠紳故意玩弄「蟲」字在昆蟲／「五蟲」雙重意義間的曖昧游移,在遊戲趣味之上,實賦予小說「五蟲」比喻的思想層面以及道家萬物變化的觀念。以是,《蟬史》中慘烈的民族戰爭書寫竟爾得以在「漢族民族偏見」的批評以外,開展更深層的詮釋。在表層文

⁵⁹ Ibid.

⁶⁰ Ibid., p. 146.

⁶¹ 孫秋云,《核心與邊緣:十八世紀漢苗文明的傳播與碰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1-12、45-46、207-245。

⁶² Yuming He, "The Book and the Barbarian in Ming China and Beyond: The *Luo chong lu*, or 'Record of Naked Creatures'," *Asia Major* 24.1 (Spring 2011), p. 46. 她並且指出,明代海事發達,有關外國的書寫甚多,但《贏蟲錄》特殊之處在附有豐富圖版,這與當時的版畫發達有關,且全書包羅的國家極廣,讀者群亦跨越階級。見同文,頁44-45。



義下挖掘更多文學詮釋的可能性，亦是本書在面對容易被現代讀者以單一角度批判的西南敘事時，始終致力的方向。

敘事、虛實與記憶

本書的三個部分分別討論以「情感與世界」、「戰爭與統治」、「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為主題，分析了明清時期不同類型的西南敘事文本。這些文本的編／創者包括遊歷的文人、派任的官員、出征的將帥等等。身分不同，則觀看的角度、發言的位置以及選擇的文類便自不同。這些作品之所以成為本書討論的對象，未必因為作者聲名卓著，而是因為具有文學詮釋的可能。同時，本書雖然以文學詮釋為核心，但既以西南為題，便不能無視此議題內涵的民族、歷史等問題，以及與當代關懷的聯繫。我在前文中一再強調，以今視昔，明清文人的西南敘事洩漏了諸多文化與民族偏見，然而這並不表示這些文本應該被棄置或蔑視。相反地，在文學審美、情感深度、歷史意識、文化體認乃至對世界的認知等等方面，明清文人的西南敘事提供了一個因其邊緣性而益顯鋒利的切入點，更展示了批判性的思考與閱讀必須在對文本的抵抗與體察之間不斷折返。

誠如學者所指出的，我們習慣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的詞語概括傳統中國的強烈民族偏見，但事實上，不乏文人對異族進行客觀深入的觀察與理解；我們若只記得明清之際王夫之、顧炎武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排斥異族的說法，而不記得明代田汝成對苗人社會與文化的用心觀察，這其實是世代以來學者選擇性的記憶所致。⁶³ 時至今日，我們理應以更具包容性的角度彌補、翻

⁶³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 8.



新記憶，故而，本書選擇文本予以討論，冀以讓明清時期不同的西南論述重新浮現。不過，本書雖然力求從不同角度審思，但文本選擇有很明顯的遺憾，那便是西南內部觀點大體仍然缺席，只是經過「外來」文人的書寫而折射出來。如果未來有機會，自然應該深入探討西南本地文人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也應利用已翻譯的白文、彝文資料。這許多不足之處，顯示「西南敘事」猶有極大的探索空間。然而，「外部觀點」與「內部觀點」，卻並不是一個虛對實、假對真的二分對立關係。外來的文人與官員的發言位置固然受到背景或目的的限制，本地文人與西南民族的文本，同樣經過中介、再現、重構情感與記憶的書寫過程，而非透明的呈現。

正因如此，本書的第七章並非綜理之前六章的結論，而是別闢一徑，透過一套身分曖昧的文本——《大理古佚書鈔》，由本書作者確鑿的「外部觀點」來討論這套「佚書」宣稱的「內部觀點」，試圖理解當代的西南敘事如何企圖穿越時代而重構／虛構歷史。考證不是我的專長，近年出版的《大理古佚書鈔》是否確為重新發現的明清筆記，我本不應妄論，不過由引述的研究可知，這套書即使不是徹底的偽書，也應視為一個今昔交纏的當代文本，而「佚書」之奇蹟式的遺存與「重現」的傳奇故事本身，更是這個文本的組成部分。《大理古佚書鈔》收錄「佚書」三種，但既是三種，何以稱作一個文本呢？這是因為在我的閱讀詮釋下，這三種分別宣稱創作於明初到明代中後期之間的筆記，其實共同構成一個（過於）完整的「移民」敘事。不但如此，這還是一個具有政治寓言性的敘事，透過斷裂的歷史敘事碎片與不斷回歸的鬼魅影像，虛虛實實地回應諸多有關戰爭、毀滅、記憶、彌合、認同的問題。本章一開始便引用了清代乾隆時期雲南白族



學者師範⁶⁴的浩嘆——在元明交替的破壞之後，「雲南無史」。此一宣示的基礎不見得是事實，而是一種態度，或者說地方的集體精神狀態。因為有「無史」的空虛感，所以要以更多的敘事填補之，豐富之。出於此志，師範本人曾編纂大型的雲南史料《滇繫》，而我們今日所見的這三種「大理佚書」，更可說是以一唱三嘆的方式回應同一個「無史」的集體心理缺憾。

以當代的視角來看，師範的宣言與《大理古佚書鈔》的出版，儘管時代有別，都是雲南內部重構歷史記憶的表現。近年來人類學界留意西南地方菁英與國家力量在民族歷史書寫上的競逐與合作關係，亦即國家力量意圖規範歷史書寫，地方力量則與國家進行溝通對話，從而書寫己身的歷史以建立主體認同。⁶⁵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不論是出自內部或者發自外部，西南歷史敘事皆出入虛實之間，且往往是中央與邊緣地方協商關係的表現。本書第五章討論的奢香故事便是顯著的例子。事實上，由此觀點來看，本書討論的所有西南敘事的文本，都是記憶的組構與表現，這也正正是本書以「敘事」一詞指稱這些文本及其形成過程之故。換言之，散發著「偽書」氣息的《大理古佚書鈔》，背面傅粉地洩漏了明清文人西南敘事的特質。

最後，必須一提本書所連結的學術脈絡。之前已經說明，我認為西南敘事牽涉文化、政治、戰爭、美學、地理、民族、性

⁶⁴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師範是《蟬史》作者屠紳擔任雲南師宗縣縣令時拔擢的門生，兩人相交甚深。

⁶⁵ 彭文斌、湯芸、張原，〈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人類學界的中國西南研究〉，頁12-13。這自然不是僅限美國人類學家獨有的視角。例如，臺灣學者連瑞枝曾討論明朝政治勢力進入大理後，土官如何透過地方傳統的再造來建立自己的政治聲望，並爭取地方歷史敘事權。他們主導編纂山志，表現土司的地方意志與歷史意識，而修建佛寺、執行國家祈福儀式，更塑造土官儀式的正統地位。參見連瑞枝，〈大理山鄉與土官政治——難足山佛教聖山的形成〉，《漢學研究》第33卷第3期（2015年9月），頁131-168。



別等諸多問題，提供文學詮釋豐富多元的層次，而當今人文社會學界普遍關注的認同、族群等等問題，自然也是任何處理與邊域相關主題所不能迴避的議題。另一方面，不可諱言的，新清史的思考也是本書發展脈絡的一部分，尤其是對非漢民族主體性的注目，以及對非漢文化與漢文化之雙向影響的考察。不過，不論是國家、族群、認同或新清史，都不是本書的依歸。換言之，本書意旨並不在回答明、清時期是否有同一性「中國」的存在這樣的問題，而各章的討論雖然強調西南各族群歷史文化的特性，以及與中央王朝及漢族文化的折衝關係，但我仍主張我們必須正視長久以來漢族與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區的影響。⁶⁶ 如果說一致性（unity）與多樣性（diversity）之間的緊張關係往往是邊疆與族群研究的核心議題，⁶⁷ 那麼我更希望透過對各類型文本的文學詮釋，說明我們需要文學的感知才能探觸西南敘事的核心，以及其文學與文化意義所在。至於打破二元對立，以多視角觀察及理解漢與非漢、中心與邊緣、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如何在文本中呈現，更無非題中應有之義了。

以文學視角探問西南，既然尚屬稀見，自應有餘音不絕。此一研究思路，未來如何繼續開展？與其具體舉出可能的題目，我以為不如轉換文類作為一喻。清代詞臣畫家鄒一桂（1686-1772）

⁶⁶ 晚近，在美國已發展二十年以上的「新清史」，開始在美國以外的中國史學界引起熱烈討論，正反雙方激烈交鋒，除了學術論辯，亦不免政治立場的對立。我認為傳統的漢化說確實局限很大，而本書的討論主要也是透過明清漢族文人的文字，折照出西南歷史文化的主體意義，但我也部分同意一些學者的主張，也就是我們不能否認漢人社會與文化在清代這樣多民族的帝國中發揮的重要影響力。例如趙剛便表達了這樣的主張，參見趙剛，〈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國的大一統話語重構〉，收入楊念群主編，《新史學》第5卷「清史研究的新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45。

⁶⁷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 3.



在雍正年間曾擔任雲南道監察御史及貴州學政，創作了以湘黔風景為主題的冊頁《楚黔十二景》，後為友人攜去。回京後，他再次以西南景色為主題進行創作，這一系列畫作表現了許多貴州的著名風景，例如相見坡、飛雲巖、白水河等等。鄒一桂將此畫冊題為《山水觀我》，他在序文中說：

壬戌還京師，從禮垣，涼秋夜直，宮漏方永。靜憶在黔六載，披荊涉險，如在夢中，而林壑在胸不能去，乃追而圖之，得景十二幀。譬如夢醒說夢而誕幻，不妨姑聽也。⁶⁸

這一段自述具有高度的敘事性與藝術自覺。在黔六年的「我」與宮垣夜值的「我」，在不同時空形成了對話關係。勾連二者的，是記憶。而鄒一桂意識到，這記憶並非完整具足的整體，而是推移升降的動態。艱險困乏之苦，被選擇性地推擠到記憶邊緣；林壑自然對心靈的衝擊，卻是「不能去」，而不只是「不去」——也就是說，即使有意排除這個記憶，也做不到。於是，鄒一桂反起而「追」之，企圖用圖畫的方式將流動的記憶捕捉、定像。在這段敘述中，黔地的記憶猶似化為有意志的主體，林壑之憶既固執不去，又變動不居，而與畫家進行了迎拒往復的對話。因為意識到圖畫只是嘗試捕捉流動的記憶，所以畫家進一步強調畫冊的表現其實是一種「誕幻」，亦即並非真實。至於「山水觀我」的題名，比起第一個版本題為「楚黔十二景」，更具有藝術創作的哲思。鄒一桂在序文中如此解釋：

即以山水論，圖中所列者，可謂旁人未語。奇特如圖中

⁶⁸ 曾督貴州學政的李宗昉（1779-1846）在其所著《黔記》中完整抄錄了鄒一桂楚黔畫冊《山水觀我》各頁的題詞以及序文。見李宗昉，《黔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5冊，頁585-587。



者，豈少哉？不過知己過而輒忘已爾。在山水固無求，亦無憾也。然人不觀山水，山水日起而觀人。人之往來於黔山者，豈少哉？是冊也，余將以之為伯牙焉。故題之曰：「山水觀我」。⁶⁹

畫家認為，山水與人之間，其實是一互動的關係，而且是彼此揀擇的。各有奇勝的景色，何者留下印記，何者隨眼而逝，乃由觀看之人的審美意識所決定。而鄒一桂更指出，山水亦觀人且識人，並非只是被觀看的客體而已。畫家與山水，正是彼此的伯牙。鄒一桂的《山水觀我》雖然是繪畫，但我以為，這實在是一個「西南敘事」的例子。畫家與他經歷的貴州山水之間，不只是畫家單向地以山水為對象，用眼觀察、用筆圖繪的關係。鄒一桂提示我們，畫面表現的其實是西南山水與人的互觀。尤其有趣的是，《山水觀我》的每一頁都有鄒一桂的題詞，其中融入了不少苗語的音譯。⁷⁰當苗語以音譯的形式置入題詞，更為畫面增加聲音的層面，暗示畫家不只觀及山水，也與西南的人文景觀產生關係。如此，藝術家與西南山水與人文接觸互動，交換主客體的位置，並以藝術的形式敘述這個過程，這正是藝術家人文精神的表現。《山水觀我》系列的繪畫文本如此，就文字文本來說，豈非亦復如是？本書所探討的各類型的作者，都與他們所經歷的「西南」發生了互觀的關係，其作品就是這一過程的產物。作為讀者與研究者的我們，有責任追尋西南敘事是透過怎樣的遭遇、互觀的關係而產生，又具有怎樣的文學層次。我希望由此一體認，開啟本書對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的討論，也朝向未來更廣且深的探索。

⁶⁹ 同前註。

⁷⁰ 《山水觀我》畫冊現藏貴州博物館。「異族」與「異國」生活詞彙的音譯在本書第一章有關歌謠的部分略有觸及，也是另一個未來可以深入探討的問題。

